

基本经济制度 转变中的社会冲突

——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

李景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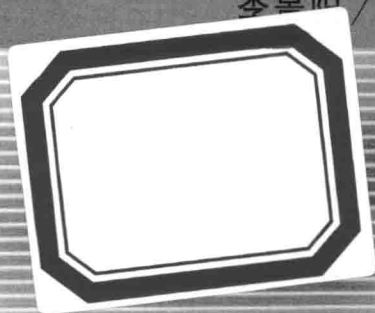
JIBEN JINGJI ZHIDU
ZHUANBIAN ZHONG DE
SHEHUI CHONGTU

東方出版社

基本经济制度 转变中的社会冲突

——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

李景四 / 著



JIBEN JINGJI ZHIDU
ZHUANBIAN ZHONG DE
SHEHUI CHONGTU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

李景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ISBN 7-5060-1536-6

I.基… II.李… III.社会分析-俄罗斯

IV.D75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450 号

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

——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

JIBEN JINGJI ZHIDU ZHUANBIAN

ZHONG DE SHEHUICHONGTU

李景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536-6/C·50 定价:19.00 元

序

本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7BGJ003)的一项最终研究成果。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与中东欧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项目已于2001年4月通过专家组的鉴定结项。李景阳同志是该项目的主要承担人之一,他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在收集、整理大量俄文资料的基础上,出色地完成了关于俄罗斯部分的研究,并撰写出这本著作。在此,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谨向景阳同志表示感谢与祝贺,并向读者推荐这本内容丰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和相继开始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国际历史事件。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大部分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换,很少涉及那里的社会结构变迁、阶级和阶层变化,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演变。本书以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较系统地论述了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那里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那里的新生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具有哪些特征?那里出现了什么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的发生和发展又具有什么特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著作还以较大篇幅介绍和论述了当代俄罗斯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的新发展,并借鉴

和运用其某些理论观点来分析那里所发生的变化。因此,这本著作不仅是一部实证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一部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

本著作的特点之一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如前所述,研究的重点是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基本上来源于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变动。因此,这项研究既是一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是一项涉及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局限于国际问题研究中所常用的方法,例如,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演绎、抽象和批判的方法。这里还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社会调查这一最基本的方法。当然,作者不可能独立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国外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但作者利用了各种条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俄罗斯社会调查的成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借鉴当代西方冲突学理论的成果,对这些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在国内十分罕见的俄罗斯社会调查材料,并构成了本著作的雄厚的资料和信息基础。

本著作的特点之二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深刻和富有新意的观点。例如:作者在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动时指出,市场化和私有化给俄罗斯带来的基本变化是单一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新生的有产者阶级和阶层业已应运而生,但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那里的社会结构仍有诸多的差异。首先,俄罗斯的“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和特性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其成员多数来自旧官僚,其资本的集聚也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而是乘新旧体制转换之机,将现成的国有财产转为私有。作者把俄罗斯“大资产阶级”的特点概括为掠夺性、

垄断性和“亲权性”，并指出：“俄罗斯的‘大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人群，按照其拥有资本的特性和富裕的程度已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上层人群同属，但这个人群众十分冗杂，且具有明显的官僚性，而作为‘精英阶层’（俄罗斯人通常如是称谓），他们还远远不具备现代社会管理的能力。”其次，俄罗斯的“中间阶级”发展比较缓慢，尚不能像在西方社会中那样起到稳定社会和抑制垄断的作用。作者还参照俄罗斯学者的论述，把俄罗斯的“中间阶级”分为新旧两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这个概念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提出，马克思并在《剩余价值论》中认为，它“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近一个世纪以来，“中间阶级”一直是社会结构理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作者借鉴当代俄罗斯学术界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中间阶级”界定为主要是由中小企业主和部分自由职业者构成的阶级，即“旧中间阶级”，而把新兴的专业技术和管理阶层界定为“新中间阶级”。这种划分可能有助于对那里的阶级和阶层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著作的特点之三是对转型期的社会冲突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例如，对社会冲突的四个根源，对社会学中的“不满”、“社会紧张度”，以及从矛盾到冲突的发展等均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并以个案分析加以补充。在论述社会冲突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时，提出了转变期的本质特征与非本质特征，典型与特殊的表现形式等，从而比较深入地说明了当前俄罗斯的某些社会冲突既是制度转换必然导致的结果，也是人为的变异和失误所造成的。本书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不满与社会冲突的关系、冲突的积累过程及冲突的功能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

专门设立了一章,论述冲突的调节和相关的理论,探讨解决冲突的方法和途径,分析调节冲突的一般原则,以及强调研究冲突初始阶段的重要性。这对认识冲突发展进程的规律和实施调节措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此外,本书还以附录的形式专门介绍了“社会变动时期的俄罗斯冲突学”和“经济制度变更中的文化冲突”。在俄罗斯,冲突学理论是随着社会大变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仅重视传统理论中的精髓,也注意吸收现代功能主义学派中的某些概念和分析方法,并结合俄罗斯社会变迁的实践形成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与思考。作者不仅较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冲突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并论述了俄罗斯冲突学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及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这无疑对研究社会冲突,特别是研究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愿本书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能为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的研究提供一些信息和启示,并由此引发出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张 文 武

2001年9月6日

目 录

序	张文武(1)
导 论	(1)
第一章 利益分割:矛盾的缘起	(11)
第一节 转制初期的利益分割	(12)
第二节 转制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变动	(33)
第三节 俄罗斯的中间阶级问题	(49)
第四节 俄罗斯的“大资产阶级”	(67)
第五节 利益分割与社会冲突	(89)
第二章 从矛盾到冲突(1) 社会紧张度的加剧	(93)
第一节 波及全社会的贫困	(94)
第二节 广泛而持久的失业困扰	(100)
第三节 社会保障的软弱无力	(108)
第四节 对居民构成安全威胁的社会犯罪	(117)
第五节 招致公众不满的社会无序状态	(119)
第三章 从矛盾到冲突(2) 走向冲突的心理趋动	(126)
第一节 冲突学中的“不满”	(127)
第二节 对什么“不满”	(129)
第三节 “适应性”与“忍耐性”	(135)
第四节 “不满”升级为“抗议冲动”	(138)

第五节 “不满”之个案分析	(146)
第四章 另一种矛盾和冲突:观念歧异	(152)
第一节 面对经济制度变更的伦理迷惘	(152)
第二节 俄罗斯人对经济制度转变有否心理准备	(156)
第三节 观念“层化”:冲突的心理前提	(164)
第四节 从“阶级属性”到政治态度	(176)
第五章 冲突的表面化:矛盾转为对抗	(183)
第一节 劳动冲突与政治斗争的联姻	(184)
第二节 政治冲突的经济动因	(193)
第三节 个案分析:激进改革初期的罢工运动	(198)
第四节 个案分析:1998年金融危机下的社会冲突	(203)
第六章 转制社会中的集团冲突	(225)
第一节 社会各阶层同新资产阶级的冲突	(225)
第二节 企业家与政权的冲突	(233)
第七章 冲突的根源	(244)
第一节 社会冲突的四个根源	(244)
第二节 冲突原因的个案分析	(252)
第八章 冲突的调节	(256)
第一节 调节冲突的若干机制	(257)
第二节 个案分析:调节冲突的政府行为	(266)
结语 关于俄罗斯社会冲突的综合评价	(271)
附录一 社会变动时期的俄罗斯冲突学	(277)
附录二 经济制度变更中的文化冲突	(301)
附表	(320)
主要参考书目及论文(俄)	(331)

导 论

本书的主旨,正如题目所示,在于研究俄罗斯在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须说明的是,这种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并非涉及它的全体。具体来说,并非研究俄罗斯全面社会变革中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族际冲突、文化冲突等,而是摘取与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有关的社会冲突,或曰在实施基本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冲突。

当然,这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两个难点:一是政治冲突与经济冲突(姑且这样简称)时常搅混在一起,难以做断然的区分;二是“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可能包含着两个相交错的现象,即一种是基本经济制度变革所难以避免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冲突现象,另一种是特定国度的特定政权在具体实施制度变更过程中由于各种主观因素(例如政策失误)造成的社会冲突现象。笔者当然力图就第一种情况做好文章,以为这一点更具理论和认识意义的伸延,但仍因“搅混”的问题难于做到。

但这一题目仍应很好地去,因为这是研究转型、变迁中的俄罗斯不可忽视的角度。变迁社会与处于发展时期的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多呈现平稳状态,而前者多伴有社会震荡有时甚至是剧烈的震荡。社会冲突现象既是社会震荡的表征,又是为社会震荡“推波助澜”的要素。从社会冲突中既可找寻出政治

的、经济的以至历史的、文化的根源，亦可透视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发展中的某些不协调状态和因素。因之，对俄罗斯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无意义的。

提醒我们做这种研究的，不仅有上世纪末从俄罗斯扑面而来的严峻的社会冲突现实，还有俄罗斯的思想家们。1992年末，俄罗斯的危机状态刚刚显现的时候，俄罗斯社会科学界诸多学科的人士即已注意到社会冲突问题，并在一次重要的圆桌会议上确定了建立冲突学学科的任务，^①紧接着，1993年10月的白宫的炮声又将这一学科的研究推向高潮。以至于几年后，许多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冲突学”课程。俄罗斯人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对社会冲突问题的警觉，正像西方人在60—7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时期关于社会由和谐转变为不和谐的自我意识一样。俄罗斯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于是也以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冲突学为先导，进而建立了自己的冲突学体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思想界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震荡时期顺乎逻辑地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及六七十年代的理论成果，尤其将莫斯卡、米歇尔、达伦多夫、米尔斯、科塞、科林斯、齐美尔等冲突学家视为理论的先导，然而，他们也同样注重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思想的依托。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思想信仰的传统习惯，而是出于一种对学术思想价值的认定。实际上，当代西方的冲突学家们在构建自己的体系时也借鉴了不少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并将其视为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大师。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冲突”的课题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当然，还应看到，当代西方冲突学在冲突功能、冲突根源、冲

^① 详见本书附录：《社会变动时期的俄罗斯冲突学》。

突的辩证法、冲突模式等方面是有新的建树的。而俄罗斯的冲突学家们又以一种群体的力量从诸多角度为研究社会冲突现象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线索(鉴于本书为实证分析体系,故而将有关俄罗斯冲突学的文章作为附录附于书后)。

在开篇之始,作者以为须特意阐明的一个观点是,冲突为何物?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是,“冲突”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坏东西”?倘若认为“冲突既有破坏又有建设性”这个看法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应当说冲突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其一,它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紧张度达到极限的一种反映,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表征;其二,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当其诉诸非和平方式时对社会的秩序有着一定的破坏作用。说它还有“好”的一面是,冲突既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它就成了一个暴露社会矛盾的“窗口”,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①当然,即使冲突有“建设性”的一面,我们也不会人为地去制造冲突,我们的任务是:第一,“防微杜渐”,防止矛盾发展到冲突状态;第二,当冲突情况出现时,采取适当方式缓解冲突,抑制其破坏性的一面,防止其升级特别是升级为暴力形式,最后解决冲突。同时认真研究酿成冲突的原因,以利于了解社会矛盾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解决社会矛盾。

此外还须说明的是,在《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

① 在肯定冲突的积极意义上,西方冲突理论家齐美尔则将冲突视为一种“最具活力的互动”,一种“交往”,认为“冲突本身解决了对立双方的紧张对峙”,当然他也认为冲突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是联结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大题目下做文章,似乎应有一个很大的涵盖面,例如,面临转制的全社会的观念冲突是应该谈的,这种观念冲突不仅包括要不要“转制”的社会观念的角逐,还应包括经济变革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与冲突,然而本书只谈了第一个方面,并只在附录中对第二个问题有所涉及。又如,转制条件下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其中包括各种畸形心理和异端行为,这个侧面所反映的是制度变更和社会变迁中的个体精神变异,这里的冲突点在于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然而本书也未列专章讲这个问题。很大的原因是,本书以“利益—矛盾—冲突”为基本线索,由此决定了它的叙述实际上偏重于“利益驱动下的集团冲突”这个主题。

下面,作为本书的必要组成部分,拟在导论中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以便渐次展开后面各章的叙述。

一、俄罗斯的基本经济制度 转变包含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似乎应由经济学专家去讲。但我以为,这种经济制度既然属于“基本”的性质,就与那些由经济学家分门别类研究的具体经济制度有别。此外,基本经济制度似乎与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稍远,而与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就俄罗斯的现实说,它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可以简洁通俗地表述为“市场化”和“私有化”。前者涉及到经济机制的转变,后者涉及到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财产关系的转变。国内有些学术界同人将私有化作为子系纳入到市场化的母系中去,认为私有化的目的是市场化,是为了建立市场。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并列

地分别来说。理由是,市场不独与私有制相联结,社会主义也可有市场。这样分别来说,便于了解它们各自给予社会矛盾发展和社会冲突以何种影响。当然,考察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并非与许多具体经济制度完全隔绝。只以俄罗斯为例,它的向市场经济过渡,除了改革伊始的全面放开价格外,还伴随有后来的诸多具体制度的改革,包括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外贸体制、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小至住房制度的一系列改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具体制度都是基本制度的注脚。研究基本经济制度也不能离开对它们的研究。

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特别是与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相联系的时候,似乎更注重与经济的社会后果有关的那些制度变更的内容。因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冲突通常是以关乎社会集团利益的经济社会后果为中介的。

那么,俄罗斯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的主要涵义是什么呢?简言之,仍是“市场化”与“私有化”两大项。做具体表述则是:

上世纪末,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以西方为模本,从制度上对原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大面积改造,改变了原有经济体系的基本性质,以市场运作代替了国家指令,以非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主体代替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并由此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

具体来说,俄罗斯在“市场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全面放开价格,实行价格自由化政策;开放内贸外贸市场,鼓励自由竞争,并实行积极吸引外资政策;改革财政体制(包括预算体制和税收体制),使其向社会公共财政模式转化;改革金融体制,发展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资金市场、证券市场等;调整产

业结构,如实行“军转民”,以适应市场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以收入分配的多渠道代替单一的按劳分配,以保障的社会化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代替保障的高度集中管理和国家统筹资金;适应自由化经济需要,实行人口自由流动,建立劳动市场,等等。在私有化方面,经过“小私有化”(指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小企业的私有化)和“大私有化”(指对国家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使 60% 以上的国营企业转变为非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使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的比例转变为 4:6,而在产出上,则使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8%,非国有经济占 72%(其中私营经济 28%,据 1996 年统计)。由此,完成了以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为基本过程的“大众私有化”亦即财产所有权的大转移,并为俄罗斯的“向市场过渡”准备了条件。

当然,既然这些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的内容是由人去实行的,在实行中会发生某种主观变异和失误,故而,在讲这种转变对社会的影响时,还需补充人为的变异和失误方面,这些方面是:全面放开价格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卢布贬值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大幅度下降,旨在抑制通胀的财政紧缩政策又使国民生产失去资金支持,从而导致了经济衰退;内外贸市场的开放,由于缺乏法律规范,造成投机盛行,市场无序,经济犯罪恶性蔓延,国家资金及稀缺物资外流,少数人暴富和多数人付出惨重代价,从而招致广泛的社会不满;虽然进行了诸多税制改革,但因财政秩序混乱,偷税、逃税、抗税现象严重,造成国家收入下降,财政紧张,并由于税收过重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发展金融市场过程中,由于国家控制削弱及法制不健全,致使金融投机活动猖獗,破坏了正常财政金融秩序,并使居民利益受损;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军工企业转产,由于传统惰性十足、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和

市场环境差等原因,造成转产艰难、进展迟缓的情况,并由此带来大面积的停产、半停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化等项改革由于中央、地方及居民个人资金短缺原因,实际上削弱了社会保障机制,特别使需要社会救助的居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在私有化方面,国有资产的廉价出售、私有化过程中的权力膨胀及各种各样的违法违规行为,使巨额资产集聚于少数人手里,并使民间股份徒有虚名,从而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过程,如此等等。当然,还须一提的是,政权危机和政局的不稳定,亦使经济过程时常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甚至酿成人为的危机,这同样导致了“转制”的变形以及诸多不良的经济社会后果。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变化?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难点是:改变基本经济制度要由“官方”来实施,那么,就需要问一句:实施的结果如何?具体来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到底建立起来没有,或者说,俄罗斯的市场发育到了什么程度?市场竞争形成了没有?市场垄断在怎样的程度上被打破?而私有化,在股份化和现金购买两个阶段之后,在形式上大部分企业私有化或非国有化之后,国家财产是否真正转移到民间,又在怎样的程度上在民众中培育了私有者,出售国有资产的结果是否给企业和经济带来了活力?

另外的一个难点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某些变化或社会后果,究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常转变带来的还是无序市场带来的呢?抑或是“掠夺式”私有化(俄国人如是说)带来的呢?

当人的要素难以从制度变革中摘除的时候,笔者只能以理

性为依据很概括地说：市场化和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基本变化是：过去的单一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财产从国家手里的丧失（且不管它落入何人手里）打破了国民“吃大锅饭”的根基；人们开始以拥有财产的多寡而归属于不同的人群并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利益出现多元化；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如此等等。当然，若考虑那些人为因素，还可以说，无序市场使投机者暴富，并由此造成两极分化；“掠夺式”私有化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更加深了社会不公正，如此而已。

三、这些变化中的哪些因素可以引发社会冲突？

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想建立一个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即社会冲突乃是以人（或社会集团）为主体。而人或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皆以利益的实现为轴心。

从这个基本看法出发，就应从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的诸多后果中去发现，哪些因素触动了这根社会的最敏感的神经？从这个角度说，冲突学所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本身。而社会财富的分配，既与特定国度所仿效的某种体制模式有关，也与这个国家的政权所取的政策倾斜有关。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则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和结果。

以利益的观察点为中心，我们可以找寻出俄罗斯转制过程所衍生出来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因素，它们是：

第一类，采纳新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带来的某些因素。